

浅析当今中国“文革”重来的社会心理基础

李玉婷¹

内容摘要：本文以分析“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入手，从“领袖”、“社会感染”和“理想主义”三个角度，步步深入地理解这场社会政治运动的大众心理基础，细致阐释群体对个人思想、感情及行为的巨大影响，进而将视线转回当下的转型社会，描述“今天”与“文革”之间社会心理基础某种共通之处，结合对当今中国民众心理震荡原因的思考，反省根源。最后提出，寻找制度层面的公约，凝聚深化改革的共识，重构社会共同的价值信仰将是彻底埋葬“文革”的最佳路径。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发更深入的思考

关键词：“文化大革命”、社会心理基础、转型时代、改革共识

A Brief Analysis for Social Psychological Basis for Reappearance of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Yuting Li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analyzing the onset of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aiming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popular psychological basis of this social and political campaign step by step. We will also explain the huge effect of groups on thoughts, emotion and behavior of individuals. Then we move back to the transform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describe some common points of social psychological basis between today and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We also introspect the source of this social psychological basis, combining our thinking of the reason for psychological vibration of Chinese people nowadays. Finally we propose that the best way to eradicate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is to find institutional conventions, to build consensus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and to reconfigure the common social value. We hope that this article can start a discussion and provoke deeper thinking.

Keywords: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social psychological basis, transforming period, consensus of reform.

¹ 李玉婷, 151080022, 社会学院2015级本科生, 151080022@smail.nju.edu.cn, 15185578181

2016年5月16日，距离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布整整半个世纪，不少人密切关注着中国官方媒体，关注他们将如何解读“文化大革命”——这场人类史上罕见的、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影响巨大的社会政治运动。直到17日凌晨，《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才发布了题为《绝不允许“文革”错误重演》的文章，坚持了1981年中共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²。

从中国千年历史的角度看，底层人民从来都是政治自然的“疏离者”，除非遇到足够恶劣的生存环境（往往是天灾加苛政），否则是不会、更不敢参与政治活动的。然而，“文化大革命”从社会的文化领域开始，逐步发展到个人生活和政治的方方面面，所有中国人都无一例外的卷入了这场长达十年的运动，其中爆发出的狂热的情感不可谓不真实、不可谓不强烈。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来看，“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绝对不是必然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然而，从文革爆发前中国现实的社会状况来看，它的发生又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必然性。因此，如何理解“文革”背后所显露出来的社会心理基础，是这篇文章的首要切入点。在此基础上，文章将通过比对当今中国的社会心态和心理基础，尽力回答这个问题——是否有某种可能，导致当今中国再度爆发“文革”？

二、“文革”之要素：领袖、社会感染和理想主义

一. 以毛泽东为领袖的大众政治心理形塑

作为“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本人的动机从来都是国内“文革”研究的重点之一。尽管在后期，毛泽东对“文革”的继续扩大以及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也表现出反感和反对的态度，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时的“文革”已经是一场无法被领导者控制的动乱了。从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革爆发的17年中，毛的个人声望和形象被不断提升、美化，他被传颂为“人民的大救星”、“不落的红太阳”。这些宣传不出意外地演变成了对毛的极端个人崇拜，演变成了大众政治心理重要的一部分。刘松阳，刘峰（1991）认为，大众政治心理是指一般社会民众对于政治的态度、信仰、理想、和价值的总和，而王浦劬（2005）……认为大众政治心理是指借助于传播媒介所提供的政治信息，社会成员之间相互沟通、相互影响而形成的群体心理。正如韦伯所说：“人类的行为是由人们之间的互动所形塑的”，这种政治心理区别于个人在政治上的喜好或倾向，体现了在互动中形成的社会整体，对人们心理和行为能产生的巨大指向性作用——不论这种作用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群体的突生性质也使得大众政治心理有着“去个性化、情绪强烈、要求激进变革、责任分散”等特点。

²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

本质上看，领袖崇拜是大众对权威人物的追求和渴望，是个人渺小感释放的出口，“如一种逃避自由的机制，是放弃个人自我的独立倾向，欲使自我与自身之外的某人或某物合为一体，以便获得个人自我所缺乏的力量”（弗洛姆，1941），这种大众心理机制催生了“造神运动”的发展。然而，主动放弃自由转而投以权威的心理基础并不是真的起源于“领袖的伟大”，而是起源于“个人的渺小”。在文革前的17年中，学校作为个人进行社会化的场所，其实现社会化功能的重要程度已经远超前于家庭，家庭的情感功能和经济功能已经被极大地削弱。一方面，个人在社会主义的教育体制下接受忠诚教育、阶级观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以适应“左”的社会政治环境，被寄托着改造世界的宏大社会使命，为“实现共产主义目标奋勇向前”；另一方面，个人被视为是“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在社会这台庞大的机器上，只能作为一只没有个性的零部件运转在需要自己的地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极端集体主义观念让人化身为无意义的粒子，彻底将个性和独立埋葬。这种内在的心理动因有着矛盾但又一致的方向，使得群体将渺小感和卑微感消解于伟大而壮烈的“阶级斗争”事业中，并为之寻找引领他们事业并消解此种失落的“精神领袖”。

可以看到，在群体之中，“扯平”的趋势——即强调在受压制的平庸水平上的绝对平等，有着潜在的过程。弗洛伊德认为：群体“通过对同一个目标有着相同的爱戴而互相认同”，在这里的“目标”，即指“领袖”。个人有着“服从的欲望”，并用领袖的集体理想替换了自我理想，成为一场浩大运动的“分子”。

尽管在四、五十年代，毛泽东对“个人崇拜”仍抱有极大的警惕和反感³，可随着国内政治舆论环境的变化，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看法的转变，学毛选、背语录逐渐成为了一件相当时髦的事，雷锋式的“螺丝钉”人物成为了青年的榜样。到了1966年7月，毛泽东意外地出现在武汉，畅游长江一个小时，全国上上下下赞颂毛“万寿无疆”的局面成为了那个时代“领袖崇拜”登峰造极的标志之一。于是，以领袖为核心的大众政治心理便被这样塑造出来。

二、断言、重复、和社会感染下的狂热情感

勒庞（1895）认为，如果想在短时间内激发起群体的热情，并使他们采取任何形式的行动，有三种手段是必不可少的：断言、重复和感染。一个观点的表述越是简洁、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力、越不容置疑，比如大革命时期的“不自由，毋宁死”，比如“文革”中的“要坚持阶级斗争”。在此之后，则需要不断地向群众重复又重复断言——要尽可能不改变语言，那么这种断言则会变成“口号”，被赋予超越文本逻辑之外的情感因素和政治狂热。社会感染是一种较大范围内的情绪与信息传递过程，有双向性、爆发性和接受的迅速性等特点。对社会而言，向社会成员宣传和灌输政治知识，是维持政治体系正常运行并有效实现政治稳定的要求，强调舆论传媒的导向性是执政党控制社会成员政治社会化的必要手段和途径。（郭晓明，2006）而建国以后，大众传媒领域的主流语调逐渐向党报、党媒靠拢，新闻媒体的意识形态色彩愈来愈浓，

³ 1950年5月20日，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决定在市中心修建开国纪念塔，塔上铸毛泽东铜像。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在来函“修建开国纪念塔”旁批写“这是可以的”；在“铸毛主席铜像”旁批写“只有讽刺意义”。他最后在公函上写下批复：“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

舆论传媒的政治化使得这种断言和重复不仅成为了可能，更使得社会感染的范围逐渐扩大。社会感染从不依赖于理性的推理，支配着大众的也不是论证，而是榜样和领袖的力量（勒庞，1895）。当这些断言在集体无意识中慢慢内化为整个社会的心理基础时，将不会有人质疑它们的正当性，“常识”作为一种隐形权威被建构起来。

在建国后的17年中，最具影响力的报纸是《红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这些报纸有着最广大的阅读人群，同时有着宣传党的政策、发布通知等重要功能。根据刁晏斌（2008）对“文革期间”《人民日报》的语言特征分析，诸如“最”、“无比”、“极其”这样的极端词语使用量大且频率高，并且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暴力语言（包括攻击性言辞、谩骂性言辞、贬斥性言辞和威胁性言辞）也呈“泛滥之势”，整体而言，《人民日报》的语言千篇一律，句型单调、统一。可以看到，由于“政治挂帅，政治优先”的取向和舆论环境的单一，人们除了被迫接受“断言和口号”，几乎毫无批判思考的可能性。在这些高频词汇和句型中，“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坏——好”、“敌——我”、“反动——进步”的二元对立营造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氛围，并由此凸显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必要性和合法性，赋予了“八九点钟的太阳”们进行社会大改造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群体的意见和信念尤其会因为传染，但绝不会因为推理而得到普及（勒庞，1895）。这种情感和信念在较大群体内产生循环感染，反复振荡，反复循环，引发强烈的冲动性情绪爆发，导致非理性行为的产生。如果说当时的中国还可能存在不为“断言和口号”所动的群体的话，那便应该是部分知识分子阶层，但由于1957年后“反右”运动的逐步扩大，知识分子被逐步打倒，最终划入“走资派”阵营，“文革”这场运动便真的成为了一场群众的狂欢和悲哀，人们在情感的反复渲染中丧失理智，变得癫狂。

（三）现实的“相对剥夺”和理想的“绝对平等”

当一个群体将理想主义推到极端，将之奉为自己群体深信不疑的信仰，并在现实社会中用不被限制的权力强力推行的时候，就会导致整个社会的悲剧。“文革”的发动确实和毛在党内的权力斗争息息相关，但并不能就此简单地将“文革”归于权力斗争的产物。可以说，毛对自己理想的社会是有着非常明晰的构想的：（连儒来，2003）毛想要建立一个绝对平均的、消除社会分工的“自由”社会，他认为人“不自由”的原因是因为社会分层下的等级制度观念，即“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只有通过不断的阶级斗争，以“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这种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来自于他个人在青年时期就已经成型了对于大同世界、共产主义社会的憧憬，并可从他写给林彪的信中窥见端倪⁴。暂且不论这样的社会是否可能，仅从当时现实的环境来看，这种要求绝对平等的理想有着非常广泛的群众心理基础。

⁴ 五·七指示：（毛泽东）要求各行各业都办成一个大学校。“军队以学习军事、政治、文化为主，把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文革”前17年的社会，积累了太多矛盾。一方面，由于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的直接后果——“三年困难时期”，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中，人们发现原先许诺的共产主义美好社会竟然是“吃不饱饭”的，而由于“反右”的开展，没有人敢对现行制度提出异议，只好忍气吞声；另一方面，权力的不设限为“寻租”留下了空间，新中国庞大的官僚队伍⁵无可避免的出现了贪污腐败的现象，共产党中也有“脱离群众”的官员，双轨的医疗、社会保障、特供食品、定期补贴等等，在当时人们普遍极端贫困的对比下，“相对剥夺感”愈发强烈。由于垂直管理的严密政治体制，新中国的政权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到了社会有机体的每一寸皮肤，“村支书”、“生产队长”成为了近在咫尺的参照群体，不满的情绪弥散在社会成员之间，只等待一个宣泄的机会。由于理想和现实造成的巨大落差，公众不断升高的期望同样具有对政权“相对剥夺”的感受，而“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信念分散了个体遵守原有社会规范的责任。人们有理由相信，“新阶级”⁶存在于当时的社会中，只有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限制和消灭社会分工、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的社会才是真正理想的社会。人们同样有理由相信，这样的理想社会完全有可能通过各种斗争手段来实现，“只要结果是正当的，那为了实现这一结果的任何必要手段都是正当的”。对于“绝对平等”的迷恋同样可以追溯到道家的“大同世界”——即“幼有所养，老有所为，财产公有，男女平等，此为‘大同’”。“大同”思想在民间流行千年，也已经成为社会和民族共同心理基础的重要记忆。

简而言之，在“文革”中，理想主义被推到极端，逐渐泛化，“真理式”的社会理想成为大众的共同诉求，并在伟大领袖号召和带领下，相互渲染着猛烈而狂热的感情，力图“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世界”。这一系列的社会认知、社会信念和社会情感共同构成了“文革”时期的社会心理基础，并投射在了社会成员的共同行动中。

三、转型时代：唯有凝聚改革共识

1976年是多事之年，周恩来去世、“四·五事件”、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十年“文革”的社会经历了刚刚爆发时大众的激动、癫狂，到后来的倦怠、反感、厌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1976年比1978年更为重要⁷，这一年标志着社会大众“观念的水位”经历了多次起落，已经非常迫切地想要重寻恰当的位置，而毛泽东的去世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真正的终结。七八十年代的一系列改革奠定了后来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方向，似乎也真的抛弃了曾经的那套价值观、生活

⁵ 高华：“新中国建立了最庞大的官僚队伍，以民国时期的南京江宁县为例，那时江宁县的行政机构仅有一科三处。”

⁶ 吉拉斯，《新阶级》。作者为前南斯拉夫领导人，他认为在无产阶级胜利夺权并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后，公有化后的资产将被官僚阶级收入囊中，形成一个新阶级——“他们是贪婪而不能满足的，就像资产阶级一样，不过，它并无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朴素和节俭的美德。新阶级的排斥异己正像贵族阶级一样，但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格。”

⁷ 孙扬：《七八十年代——改革源起再思考》讲座

态度和社会行为方式。然而，但这并不代表“文革”运行的逻辑就是不能被今天的社会大众理解和接受的，在社会心理基础方面，“文革”真的不可能重来吗？

（一）缥缈的领袖：个人的利益动机觉醒与社会价值观转变

早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毛就已经能够相当熟稔地动员集体的力量进行革命，这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也成为了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高华，2000）。如果说那时的运动还仅仅是在党的框架中进行，那后来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则已经扩大到了党外，发展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革命运动”。需要强调的是：领袖崇拜和群众基础是“文革”爆发两个缺一不可的维度，个体独立感和意义感的消解也是重要的标志，相对封闭和压抑的舆论环境给塑造领袖创造了可能。

切换回当下，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以消除长期集体生活造成的个人惰性为起点的，这不仅意味着社会激励机制的建立，更意味着人们在心理上的利益动机觉醒（王奋宇，李路路，1993）。在打破如“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一类的“精神紧箍咒”后，势必使得社会价值被赋予更多的个人倾向、自主倾向，整体取向更加偏向务实和效率。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由于政治体制的固有的模式，在今天产生“威权式”的领袖并非没有可能，但想要从上至下的树立一位“领袖”的绝对权威，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然而，“领袖”看上去缥缈了，群体性事件却愈来愈多且密集。由于改革开放后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自然导致了社会心理出现分化，甚至是分裂。如何整合出“普遍主义价值”⁸的社会心理，在合理的制度中引导人们在逐利过程中的理性行为，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二、“文革”与“群体性事件”：心理落差、负向情绪到底层认同

勒庞在《乌合之众》的开篇便说到：“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群体的时代。”莫斯科维奇也曾断言了相似的处境⁹：“我们生活在一个大众社会（mass society）和大众人（mass men）的时代里。”近四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社会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不断增加，尤其是最近几年，群体性事件数量呈上升趋势，激烈程度也在增加。在中国社会语境下的“群体性事件”，与“集体行为”、“集群行为”、“社会运动”的内涵并不完全一致，它是一种群体在体制外抗争但不反体制、聚众但非正式组织化的抗争活动（肖唐镖，2012），而非具有意识形态和理论依据、完整组织基础、动用大量社会资源的社会运动或革命。王赐江基于目标诉求将群体性事件分为三类，即“基于利益表达的群体性事件”、“基于不满宣泄的群体性事件”和“基于价值追求的群体性事件”。

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共同动因来自社会成员间社会心理的分化，与利益格局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比较的角度看，群体性事件极大地区别于“文革”：（1）“文革”有着完整的理论理论依据，有着一以贯之的政治目

⁸ 彼德·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⁹ 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1981/2003

标，是建立在一元的社会心理基础上的“革命运动”，而群体性事件则是多元社会心理的冲突与对抗，经常通过偶发事件聚合，有较低的组织性和理想目标，往往针对具体的社会事件，如“四川什邡钨铜项目”、也有情绪宣泄的“贵州瓮安事件”。（2）“文革”有个人崇拜的长期准备，它否定除毛泽东外的一切权威，其纲领被奉为绝对真理，而群体性事件则往往缺乏组织性，通常很难坚持较长的周期的抗争，更不用说领袖了。（3）“文革”运用不受限制的权力强制推行其方案，妨碍目标者即敌人，对敌人要残酷斗争，这种非黑即白的“敌我阵营”划分和“阶级斗争”方式是那个时期社会普遍接受的认知和行为方式，并内化为全社会共有的价值观；然而今天，群体利益的多元、个体在不同维度上所属社会群体的不同，带来了人们地位的交叉和异质性，社会很难准确的划分“敌我”（王奋宇，李路路，1993）。

但是，如果从宏观的角度去看待群体性事件如此频发的内因，很难不惊讶于这种心理基础与“文革”时期的大众狂热有着相当一致的方向，尽管“文化大革命”式的“文革”很难在今天被复制，却不意味着另一种形式的“文革”就已经被埋葬了，它随时有可能在社会溃败的某个节点借尸还魂，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再次制造浩劫。2016年全国人大会议上，西藏代表团成员胸前佩戴习近平像章，几乎是毛泽东像章的翻版；也有例如《东方红》、《要嫁就嫁习大大这样的人》涉嫌个人崇拜和怀念“文革”的歌曲流传；5月16日，“五十六朵花”微博发布了一场红色演出的照片，有明显“致敬文革”的部分，引起网友哗然；笔者从三位重庆同学回忆中了解到的“唱红打黑”，已经有着比较严重的个人崇拜倾向了，薄熙来在当地甚至有“平西王”的绰号。如果这仅仅是个人层面政治立场的差异，其实不足以构成“文革”重来的基础，但如果当这些个人有着群体性的其他共通之处时，形成社会心理层面的冲突和对抗，则完全有可能导致以政治诉求凝聚起来的“群体性事件”甚至“社会运动”。

周晓虹（2011）认为，转型时代的“中国体验”发生了极其迅速和猛烈的变化，同时出现了极端化、两极化、二元化的倾向。当中国从原来接近平均主义的同质化社会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异质化社会之时，尽管人们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度已经提高，但随着感受幸福的阈限值大大提高，现实和期望之间还是出现了巨大的落差，不可避免的演变成了整个社会的“仇富”心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几乎没有人不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人们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在当下的空间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如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社会保障不健全、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不公平、腐败和权力滥用等。“我爸是李刚”——一句爆红的话在2010年触犯了众怒，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内涵，即反映了一种突出的社会心态——“群体性怨恨”（王俊秀，2011）。“群体性怨恨”不仅与社会群体“相对剥夺感”有关，也确实与社会不公、个人发展困难的现实有关，由于社会流动难度的加大，阶层出现固化的趋势，“富二代”、“官二代”等词汇直接反映了社会对于财富和权力持有者及其后代的嘲讽，尤其体现了民众形成的类似“财富——不公”，“官员——腐败”，这样比较消极的思维定式。

强烈的不安全感、不公平感、不信任感和被剥夺感不可避免的会引起社会负向情绪的爆发，更由于阶层流动机会减少，社会已经出现了较为普遍的“底层认同”，这种现象将很有可能导致群体的极化。一位记者曾经想要写一篇《中国

中产阶级调查》，采访的警察、医生、教师、白领、律师等群体却几乎都不认同自己属于中产阶级，而属于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王俊秀认为，共同的底层认同会逐渐形成一种底层群体的群体心态，——尽管他们在经济收入上已经进入了平均数，但却有“向上流动”的绝望感和随时“向下流动”的不安全感。这种心理状态将极有可能促使他们获得一种“集体的心理”，“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独自一人时的感情、思想和行为颇为不同¹⁰”，最终采取共同的行动。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说，对一个群体而言，最可怕的不是被压迫，而是发自内心的绝望和无力感；对一个以社会而言，最危险的是中间阶层的缺乏。社会群体的底层认同化形塑了心理层面的倒“T”形社会结构，而这种社会心理结构的危险性，是不言自明的。而根据戴维斯的“倒J理论”，则解释了较大规模的“革命”为何通常发生在经济成长后，而非经济危机后，这通常是由于人们的生活期望与经济发展迅速提高，而一旦发生“挫折”，则很有可能转向“攻击”。总而言之，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而言，“文革”的阴影并未完全离去。

（三）社会心理的重构：从制度层面寻找凝聚共识的可能

随着社交媒体尤其是微博、微信的迅速发展，社会舆论的生态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是信息的制造者、加工者和传播者，都是“自媒体人”。但可以发现，这些民意背后也隐藏着深深的危机。根据2013年的《社会心态蓝皮书》（王俊秀等，2013），阶层分化和底层认同使得民意极端化，常常表现出一边倒的声音和行为。极端化格局下，群体进一步分化。常常出现由事件引发的，短暂、松散、无组织、无目标的利益群体。越来越多相同利益、身份、价值观念的人们采取群体形式表达诉求、争取权益，群体间的摩擦和冲突增加。当下中国，很多热点事件往往都是在网络上爆料、传播、发酵，纸质媒体再跟进，政府或有关部门再应对和解决。为了防止社会的分裂，调整“今不如昔”的认知偏差，凝聚共识是当务之急，重构社会价值相当重要。

从目前中国的社会环境来看，以民主、市场、宪政为核心的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国传统新儒家，是三种主要的思想资源，不论如何，继续深化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这恐怕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都不会产生分裂的主张（孙立平，2014）。必须意识到社会心态与整个转型时代背后利益格局的密切关系，更不能忽视决定利益格局的市场、权力和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的生态其实早已经改变，停滞的是自九十年代以来的体制改革。我们用前三十年的时间证明了权力无法打包一切，用后三十年证明了市场同样无法打包一切，在权力和市场之外，还需要一个健全的社会。

只有认识到当下中国社会在继续改革方面遇到的制度性难题，才能真正从根源上入手，解决人们心理落差、负向情绪和底层认同的深层症结，社会心理中“文革”的阴霾才可能被真正驱散。

¹⁰ 勒庞·古斯塔夫，1895，《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四、结语

对于笔者这代人（90年代后期出生）而言，“文革”更似一个敏感、危险、禁忌的政治符号，却常常忽略了它也是一场真实的、持续的、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发现“理想主义”可能会导致恶果，是一件比相信“领袖”会导致恶果要难得多得多的事。如同波尔布特¹¹在柬埔寨所犯下的罪行，“恶”竟也有“善”的起源。再比对改革开放后社会心理巨大的转弯，很多人以为它彻底走了，其实可能只是暂时潜伏而已。关于“绝对平均”的理想，对于“权力”的某种迷恋，制度性不公所带来的一系列心理危机，感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人群往往隐喻着对旧体制的怀念，——或许人们并非是真要“恢复过去”，但至少也反映了唯有深化改革才可能防止“革命”的心理基础。人们会想，虽然过去很穷，但起码有一份工作和收入，现在发展很快，却把我“发展”下岗了。农民也抱怨农村经济停滞，城市中产阶级不认同自己的身份，再抬头看看那些与权力“良性互动”的群体，怨恨和怒气定会弥散。中国不能再依赖以前的高速经济增长模式来稳固人心了，问题已经不在于“发展”，而在于如何解决公平正义的问题。这需要社会的合力去共同推进，需要凝聚改革共识和社会核心价值。

或许，在千千万万人心中，革命已死。但乌托邦的许诺正以各种新的形式再现，领袖的幽灵仍在徘徊。每当人们感到压迫和绝望，每当异议或抗议被视为非法，他的幽灵可能会化为希望，再次召唤人民举起造反有理的旗帜。

初稿于2016年6月14日

终稿于6月22日

参考文献

- 艾里希·弗洛姆 著，刘林海 译，2015，《逃避自由》，上海译文出版社
- 高华，2000，《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郭晓明，2006，《影响红卫兵政治心理塑造的政治环境因素》，《兰州学刊》第9期
- 勒庞·古斯塔夫 著，冯克利 译，2011，《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李超君，2009，《“文革”期间大众政治心理研究》，《社会科学辑刊》第51期
- 连儒来，2003，《毛泽东的理想世界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
- 廖迅乔，2014，《认知视角下〈人民日报〉（1966-1971）社论的批评语篇分析》，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¹¹ 柬共红色高棉领袖，极左主义者

- 米洛凡·吉拉斯，1963，《新阶级》，世界知识出版社
- 孙立平，201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与中国未来十年的改革和发展》，《吉林党校报》第1版
- 王赐江，2010，《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化及发展趋向》，《长江论坛》
- 王奋宇、李路路，1993，《当代中国制度化结构体系下的社会心理特征》，《社会学研究》第1期
- 王俊秀，杨宜英等，2011，《社会心态蓝皮书（2011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王浦劬，2005，《政治学基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肖唐镖，2012，《当代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概念、类型与性质辨析》，《人文杂志》第4期
- 杨军，2012，《我国社会心理变化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前沿》第13期
- 张宇，2002，《当代中国转型时期社会心理失调与调适》，《内蒙古大学学报》第4期
- 周晓虹，2011，《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理解社会变迁的双重视角》，《天津社会科学》
- 朱力等，2003，《社会学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